

任东升 编

【学步集】
上卷
杨自俭文存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任东升 编

【学步集】
上卷
杨自俭文存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步集:杨自俭文存/任东升编.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1125-382-5

I. 学… II. 任… III. ①语言学—文集②对比语言学—文集③比较文化—文集④翻译理论—文集 IV.

H0-53 G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343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网 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信箱 chengjunshao@163.com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传真)

责任编辑 邵成军

电 话 0532-85902533

印 制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 mm×230 mm 1/16

总 印 张 43

总 字 数 750 千字

总 定 价 52.00 元

序 一

杨自俭老师在抗日战争爆发期间出生于艰苦的农村,成长于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他经历了磨难,度过了艰苦的岁月。后来,他在家乡当过小学教师,上山东师范学院学习过中文,又在山东大学和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了英语,而且最后以英语教学为主要职业。在这同时,他又学习了哲学、逻辑、历史,学习了语言学和翻译理论,在中国海洋大学这所以海洋为特色的学校里,依靠自己的努力和高尚的品德,先后做过中国海洋大学外语学院、文学院和新闻与传播学院三个学院的院长,成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为中国的翻译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根据他的成就和在学术界的影响,以及翻译学科建设的需要,我们计划为他出版文集,题为《杨自俭文存》,分为《学步集》两卷和《知行集》一卷,由杨自俭老师生前亲自收集稿子,确定收入的篇目。

这些成就与他多年来为中国翻译学的发展所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包括主办学术性强,影响大的翻译学科的学术会议,编辑一系列影响大的论文集,发表对翻译学科建设影响巨大的论文,特别是为了年轻人的成长,他甘做人梯,为他们的成长出谋划策,设计学术发展计划,为他们出版学术著作写了大量序言;他注重学科发展,为中国海洋大学文科的学科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坚持原则,责任心强,为中国海洋大学外语学院、文学院和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发展设计了发展蓝图,为汉英语比较研究会的运作做了大量工作,使学会形成了良好的风气,为学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和杨老师认识开始于他给我写的一封信。当时,我在聊城师范学院

（现聊城大学）外语系工作，做系主任。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来自青岛的信，邀请我作为专家参加青岛海洋大学外语学院的海大七十周年校庆学术活动，做个系列讲座。我有点受宠若惊，虽然以前也到其他学校做过几场讲座，但还没有这样隆重地被邀请过。从这封信中知道杨老师是青岛海洋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发表过一些论文，但我对于这些论文知之甚少，因为他常以笔名沐莘发表文章，还不知道这个笔名就是杨老师的。

青岛是我那时十分向往的地方，因为我以前到青岛参加过培训班，同时参观了青岛的几个景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青岛的建筑新颖，有洋味，空气中没有浮沉，夏天不太热，冬天不很冷，与我们老家的干燥、尘土飞扬、夏天热冬天冷的气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个生活的好地方。我就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且准备了讲稿。我和山东大学的郭继德教授到青岛海洋大学参加了他们的校庆活动，并做了系列讲座，还和大家就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思路进行了交流，十分愉快，同时我们还被聘请为“青岛海洋大学兼职教授”。

在一系列活动中，我慢慢地认识到杨老师的用意：他要我们两个想办法调动到青岛海洋大学工作，而且是“蓄谋已久”。我的一个同学告诉我，有一次他到海大去见杨老师，杨老师说到我时讲，“张德禄是一个搞研究的学者，大约 50 岁左右”。实际上，我那时还不到 40 岁。

杨自俭老师当院长后，着力抓学科建设，提高学科的层次，扩大学科布局，同时着力进行学术活动，并且号召外语学院老师在搞好教学的同时，提高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号召大家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等。在这同时，他在青岛海洋大学组织了几个在中国翻译界影响巨大的学术活动。一是受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会的委托，于 1996 年 5 月 13 日至 19 日在青岛举办了该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大会收到论文 98 篇，交流的学术著作有刘重德主编的《英汉语比较研究》（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杨自俭、李瑞华选编的《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和李瑞华主编的《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经过一天的大会发言和两天的分组讨论，与会学者都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经过讨论理清了英汉对比语言学的学科性质与定位问题，在硕士生翻译专业课程建设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大家认为，对比文化学应重点进行语言各层次中文化因素的比较研究，同时还应进一步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

第二项活动是于 2001 年 4 月在青岛主办了全国译学学科建设专题讨论会，邀请全国翻译界的著名学者齐聚青岛，继续上次会议的研究成果，畅谈翻译学科建设的新思路和方法，主题有两个：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观念问题和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基础与条件。在这次会议上他还做了《我国译学建设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主编了会议的论文集。

第三是他根据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选择了一批高水平的论文,编辑成集,在国内翻译界产生了里程碑式的影响。第一本是由他和李瑞华选编的《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由他和刘学云选编的《翻译新论》(1983—1992)(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在中国翻译研究文献汇集方面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引领了国家“十五”重点图书“中华翻译研究丛书”的出版。该文集多次重印,已成为高校翻译学方向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必读书之一。杨老师为入选的每篇文章都作了中肯的点评,这些点评汇集了他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心得和学科建设的整体思路。

第四是他在学会建设中作出了突出贡献。由于他在翻译学科建设中的突出贡献,他于1998年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换届选举中被推选为会长,历时两届,于2006年交班,并被聘为名誉会长。在任期内他兢兢业业,无私无畏,对学会进行了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学会制度,使学会内部形成了良好的学风,为学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行政工作中,他时刻把握学院发展的大方向,在人才建设和学科建设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依靠他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领导能力,以大无畏的精神,解决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使中国海洋大学的文科,包括外语和中文学科,得到了迅速发展。直到68岁,他才最后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

我于1998年调到青岛海洋大学外语学院工作,同年做了外语学院院长。作为院长,我也亲自体验和体会到杨自俭老师为外语学院整个学科的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所经历的艰辛。青岛海洋大学是一所以海洋和水产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但由于在此前的三十多年中没有发展文科和工科,人们一直认为它是一所理科学校。外语学院是从一个以教大学英语为主,而且学校也特别强调大学英语教学,把大学英语教学置于外语专业之上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老师主要从事教学工作,而且主要强调技能教学;学院没有任何学科建设的经验和经历,学科发展意识十分淡薄。老师常常把教学和科研对立起来,科研工作难以开展。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通过艰苦的工作,外语学院初步建立起学科梯队,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申报成功了第一个硕士点。后来又经过大约十年的努力,使学科建设有了更大的发展,由两个本科专业发展为五个本科专业和六个硕士点,最后获得了硕士点一级学科和山东省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重点学科。我们的这些成果也都是在杨老师奠定的基础上,在他的不断帮助和指导下取得的。

杨自俭老师的这些成就是令人鼓舞的,也是发人深省的。他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是怎样成为中国著名的学者和专家的?我觉得,这与他自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密切相关。这些特质包括:

1. 崇高的思想境界。杨老师一生的追求是学问和业绩。他把做学问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他家中的墙壁全部由书组成，他与人谈话的主题几乎总是如何做好学问；他在工作岗位上总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总是把学院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在他卸掉外语学院院长职务、颐养天年三年后，校领导请他再次出山，他欣然接受。在他的领导下，不仅文学院领导班子建设得到了强化，而且还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新闻与传播专业，进而成立了新闻与传播学院。杨老师担任两个学院的院长达四年左右，不仅使两院工作步入正轨，而且还引进了大批高层次人才，使两个学院都上了层次。

2. 无私无畏的精神。在工作中，他既不怕得罪人，又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总是以工作需要和工作实际为标准，坚持公平公正，树立正气。他虽然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海洋大学，但在评定教授级别时，他已经退休，无法再评级，却从无怨言。作为我国著名的学者，他一直住着十分简陋的房子，直到快退休时才住上 95 平米的房子，是其他单位副教授及以下老师的标准。

3. 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他一生在追求未知的境域。他出生在农村，生活和求学条件都很差，所以必然会遇到学校条件差、学习资料匮乏的问题，但这都挡不住他求学若渴的精神。除了阅读本专业的书外，他还博览群书，阅读哲学、逻辑学、中国古典名著、西方名著等。一些专业书籍，老师或者学生常常在学校图书馆和学院资料室借不到，而到他那里则能够找到。

4. 深邃的洞察力。通过读书，他不仅是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还提高了自己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培养了很强的创新意识。杨自俭老师在几个学院当院长和做学会会长的过程中表现出非凡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总是能够抓住问题的实质，能够在平淡的现实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使大家深思和探讨；总是能够在纷纭复杂的现象中发现真理和实质，解决了许多学院工作中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同时为中国英汉语对比研究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学术研究中也是如此。他一直关注学科发展的大事，站在学科前沿上，为学科发展指明前进的方向。他的许多论文都是在讨论翻译学科所面临的新问题，给学科定位，指出学科发展的方向等。

5. 渊博的知识。他另一个特点是知识渊博。他不仅通晓本学科领域内的语言学、对比语言学、文化学和翻译学的理论和知识，而且还在比较深的层面上掌握哲学和逻辑学理论，了解许多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现状，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了解知识结构的特点和建构方法等。

6. 诲人不倦的精神。他一贯坚持与人为善的精神，为别人着想，考虑

别人的需求,还能够认识别人,了解别人,发现别人的长处和不足,并能够根据别人的优缺点给他们提出合适的建议和意见,抱着为别人好的理念,从不怕得罪人或者使人感到不舒服,有时候做好事而自己并不落好,但他仍然义无反顾。

7. 持之以恒的毅力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做学问和进行学科建设受到很大的影响。在外语学科做学问更难,理论基础差,成果难出,而通过上课容易获得更高的收入。这样,做学问吃亏就成了外语学科大部分老师的认识。但杨老师从不考虑个人得失,总能持之以恒;没有奖励,没有劳务费,只有劳苦和寂寞。但他有了丰硕的成果,发表学术论文约 80 篇,治学类论文约 40 篇,主编论文集多部。与此同时,他在人才培养上成果卓著,他培养的研究生大部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他为学生修改硕士论文,写满页边,花费了大量心血;他 10 多年来为中青年学者的学术著作写序文约 40 篇。

8. 高超的理论素养。他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形成了很高的理论素养,善于从理论的高度来看待学术问题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他思路清晰,思维敏锐,层次分明,对于大多数学术界关心的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具有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感性发现理性本质的能力。他为多层次、多类别的听众做了无数次讲座。虽然这些讲座的内容不都是他的专业研究范围,但他还是能够给听众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如为不同学科的学生做有关人生的报告,或英语学习的报告;为不同专业的老师做如何教学、如何做科研的报告等。

《杨自俭文存》三卷本就要付梓了,它的出版对于学术界,特别是翻译学科的建设,是一件幸事和好事。它将为翻译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启示和指导,为年轻人科研能力的提高,为学会成员如何做人提供启示和指导,为翻译学科发展提供动力。正如王菊泉教授在来信中所言,“为杨老师主编文集……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一件事。作为杨老师多年的好友以及学会的老会员,我应该感谢海洋大学外语学院……筹划和实现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因为在我看来,有这么一本体现杨老师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的文集问世,对杨老师本人来说,是个莫大的安慰,而对广大读者来说,也是一个福音。”

张德禄

2009 年 5 月 23 日(定稿)

于中国海洋大学浮山园

序 二^①

清儒陈澧曾言：“有士大夫之学，有博士之学；近人几无士大夫之学。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亦难自立矣。”（《东塾集》卷四《与胡伯蓊书》）当代学者余英时对此解释说，所谓“士大夫之学”和“博士之学”的分别，简单地说，便是“通识”和“专业”的不同，但又不止于此。“博士”是专家，其知识限于他的专业范围；而“士大夫”负领导政治与社会的重任，他们需要有贯通性、综合性的知识，以为判断和决定重大问题的依据。（《严复与中国古典文化》，载《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陈澧强调士大夫之学比博士之学重要，并且感叹在他那个时代几乎已经没有了士大夫之学。这一感叹我想也适用甚至更适用于当今这个时代。所幸在这个“几无士大夫之学”的时代，我们有时还能见到几位多少还有点士大夫之学精神的学者，使这个浮躁时代、商品经济大潮下的学术界还不至于过于苍白。杨自俭，就是这样一位学者；这部《杨自俭文存》，所体现的就是当代中国、至少是外语学界的“士大夫之学”。

“士大夫”这个词语，现在人们已经很陌生了，我们有必要加以申述。“士大夫”中的核心概念是“士”，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或者西方话语中的“公众知识分子”。在不久前一次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中，我曾提出过一个观点，认为每一个重要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曾凝炼出一种“民族品格”，成为该民族在世界上的形象符号。这种民族品格不是

① 本文原题为《当代中国的“士大夫之学”》。——编者注

指那种带有调侃意味的形象标志,如英国人保守、法国人浪漫、德国人古板等,而是正面的并且为该民族所自豪和追求的。我并举例说对英国人而言,这种民族品格就是绅士风度,对德国人而言,就是好学深思,对美国人而言,就是探新求变。对中国人呢,我提出就是“士”的精神。这种精神起始于春秋时期,就是曾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忧国忧民、终身以之的强烈的责任心。这种精神到后来通过各种语言表达出来,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鲁迅的“中国人的脊梁”等等。在做学问上,就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曾国藩的“士大夫之学”,严复的“了国民之天责”,陈寅恪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可叹的是,随着百年来不加分析地否定传统,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些优秀东西正在被人们忘却。而在治学上对“科学主义”实质是工具主义、技术至上的盲目追捧,也使订短之学成了“科学”的代名词。在这个大气候下,“博士之学”日增、“士大夫之学”日亡,就是必然之事。年轻一代更不知士大夫之学为何物。借着《杨自俭文存》的出版,让我们循着杨先生的学术道路,重温何谓“士大夫之学”,对于治疗我们的学术浮躁病,未尝不是一剂良药。

所谓“士大夫之学”,我以为至少包含以下五个方面,而杨先生都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第一,为人重于为学。

这是士大夫之学的灵魂、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核心就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中国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半个世纪来,大学教育奉行科学理性主义,实际上忘掉了这个根本,许多现象因此而起。这些年来一些有识之士正在呼吁这一精神的回归。但在我的印象中,至少在当今外语界,在各种场合呼吁做人重于做学问的可能没人超过杨自俭。例如2002年上海会议上,他以《老实做人,认真做事,严谨做学问》为题致了开幕词,强调学者要进行长期认真的自我修养,完善自己的人格,特别提出“要始终无条件地追求较高和最高的层次”、“要正确认识自己”、“要积善成德”、“要慎独自律”,并告戒大家永远记取、领悟孟子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并付之行动(《英汉语比较与翻译》(5))。2004年重庆会议的开幕词上他强调会风的重要,“它是学人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问题,它是学人的伦理道德和精神境界问题,它能决定学人的学术价值与生命。”(《学会·学

风·学理·学问·学派·学人》，载《英汉语比较与翻译》(6) 2006年烟台会议上，他特别总结了他与学会创会老会长刘重德先生刻意培植和发展的会风，其中第一条就是“高尚的道德与情操……为人为学为人在先，学术为重，淡泊名利，大公无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英汉语比较与翻译》(7)，待出版）杨自俭这么要求别人，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大家都知道，他是当今中国外语学界特别是对比语言学和翻译学界众望所归的学界领袖，靠的是什么呢？在广博的学识和明锐的学术眼光之外，我觉得更主要的是靠他几乎难以阻挡的人格魅力。而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学术界目前最匮乏的东西。

第二，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如果说人格修养是士大夫为学的第一步，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就是士大夫之学的鲜明特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最优良传统就是时刻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历史的使命紧紧地结合起来。前些年在总结严复的翻译思想时，我曾感叹说，像严复那样把从事翻译当作“了国民之天责”的人，现在恐怕再也难以找到了，甚至他的这种想法已经很难再被今天的人们所理解了。因为在工具理性主义的人们看来，翻译不过是个谋生工具或者是个人情绪的泄发，所需要的无非是技巧或方法而已。同样的，学术研究已被论文发表的要求所取代，后者更已成了敲开各种名利之门的敲门砖。当手段成了目的，还有什么事不能做的呢？因而当今学风的败坏是从知识分子人格的沦丧开始的。杨自俭曾在不止一个场合表现出对当今社会世风、学风的各种忧虑。在2006年的烟台会议上，他更形象地将之比喻为“三座大山”：“第一座是官本位”，“第二座是‘三个和尚没水吃’”，“第三座是‘重使用轻理论’的传统”。他忧虑地说：“毛主席领导我们用了不到30年推翻了那三座大山，但这三座大山恐怕用50年甚至100年也难以推翻。”正是由于有了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才会对所研究的对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通读这本《杨自俭文存》，你会感受到他在学术研究中始终在关注的是四个问题，一是如何真正解决中西结合问题，二是如何真正解决古今继承问题，三是如何解决学术创新问题，四是如何解决理论应用问题。可以说，这四个问题已涉及到了学术研究的全部，但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作出如此深刻的思考。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出“字本位”的例子，这是杨自俭近两年学术思考关注的焦点。有时人们可能会纳闷，作为一个主要活跃在外语界的学者，为什么对汉语界这个争议未决的问题有这么大的兴趣。其实字本位理论正好是杨先生所关心的四个方面的问题的汇合点或者说聚焦点，杨先生从徐通锵等人的研究中看到了中国语言学根本问题解决的希望，也看到了中国外语界语言学研究的新的前景。而这个理解，不循着杨先生自己学术发展的思路是难以做到的。就这个意义上说，收在本文集的

《跟随徐通锵先生学习“字本位”》一文,对于了解杨先生为人治学有着分外重要的意义。

第三,广博而深邃的学识。

正如上面说到的,士大夫之学与博士之学的基本区别是通识之学与专家之学的区别,也是中国传统治学与今日急功好利的所谓“搞科研”的区别。《中庸》上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两千年中国士人所奉行的学习方法。古人深知“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重要性,因而强调治学过程中的“于书无所不窥”,以“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自勉。古代的例子不胜枚举,近代的经典例子有曾国藩和梁启超,这是他们之所以能做出重大成就的原因。直到五十年代初,吕叔湘还在告诫我们,翻译工作是“杂学”,译者要“竭力提高自己的素养,有空闲就做一点杂览的功夫”。但半个多世纪来,随着学科分工的细化、知识的海量“爆炸”,特别是西方细分再细分那种分类和描写方法的引进和备受推崇,“博学”、“通才”已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人人都盯着眼前那一小块,细挖再细挖,分析再分析,例如把一个“了”字分析出十几种、二十几种用法,似乎这才是“科学”的研究。然而,“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亦难自立矣”,没有广博的学问做基础,专学也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杨自俭是当代学者中少有的明白人之一。他曾对对比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提出过六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比较丰富的自然、社会、思维三个领域的基础知识;二是英汉语言及其语言学的基础理论;三是英汉语言史及其语言学史;四是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包括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五是方法论基础(包括哲学、逻辑学、系统科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与语言学的方法等);六是对比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英汉语篇衔接手段对比研究〉序》)相信很多人看了这个单子都会吓一跳,以为这是凡人不可达到的高标准。但实际上,了解杨先生治学道路的人都知道,这是他的夫子自道,也是他治学经验的宝贵总结。我们在读杨先生文章的时候,常常会为他深邃的洞察力、气度恢宏的学术视野所折服,其实道理很简单:站在山顶看山和钻在山沟里看山,得到的景象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我还想特别提到杨先生的逻辑修养。我以为,在当代外语学者里,还没有什么人的逻辑学水平能超过杨自俭先生。这是他的论述总是那么细密、那么有说服力的原因。

第四,高屋建瓴的治学眼光。

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学养,使杨自俭在从事具体学科的研究时,站到了一个常人难到的制高点。因而他的学科研究也就有了一个与旁人不同的眼光。细心的人们会发现,杨先生的学术研究,关注的始终是学科建设的全局和最宏观的方面,诸如学科的性质、学科的定义、学科的基础、学科的地位、学科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学科的历史、学科的方法论、学科的队伍

建设和人才建设、学科的发展趋势、学科的广泛应用，等等。对英汉对比语言学、翻译学、对比文化学、典籍英译、语言理论、字本位学说等，均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他成了国内外语界公认的一位学术领袖。许多人新书出版，都爱请他作序。他的品评，常能道出作者自己所没有发现或感受不深的内容，对作者自己也不啻是个升华。我本人就为此受益不少。同时，作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深受爱戴的老会长，他不止一次发起全国性的对比语言学和翻译学学科建设讨论，为推进国内这些学科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他在各种会议上作的开幕词、闭幕词，常常是对学科发展高屋建瓴的概括和总结，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

第五，虚怀若谷、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

阅读本书的目录，读者还可能注意到，在全书所收的约 80 篇文章中，为他人著作写的序言倒有约 40 篇，占了几乎整整一半。这在当代国内外学者的论文集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有人为他感到惋惜，觉得他孜孜兀兀数十年，多数时间是在替人作嫁，却没有时间写一本他自己的学术专著。而按他的学术水平，如果有充裕的时间，不要说一种，就是两三种专著也早就出版了。这就涉及到他的另一种可贵的品格，也是传统士大夫的品格，就是淡泊名利。早在先秦时代，就有“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礼运》）这样的说法。《老子》也强调，“生而弗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第二章》）曾国藩总以“功成身退，愈急愈好”告诫自己，强调“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虽然前人有这么多的榜样，但老实说，在今天这样的“学术”环境下，真要能这样淡泊自如，还真的不容易。而杨自俭先生却做到了，这还成了他的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如上所说，国内学者出书，喜欢请他写序，以之作为重新认识自己著作价值的过程；另一方面，杨先生对请托者，一向来者不拒，他把它看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倒也不是过度的谦虚话，我发现，常常一篇序言写成，作者研究的这一领域也就成了杨先生的囊中物了。他认为这是两得益彰的双赢好事。我们常常见到，他写的序言，不同于一般作序者那样三言两语，敷衍搪塞，而是在精读、细读了原文之后，提出了真正精到的见解，使读者包括作者自己茅塞顿开。他的序言常长达一万余言，这大约也是国内外非常少见的。但这样的做学问方式，在今天环境下，是非常“吃亏”的，因为成果都是别人的，自己的研究再深刻，也只是贡献了一篇“序”而已，既进不了“核心期刊”，也算不了“学术成果”。但这样的事愿意常做，而且做得其中有乐，也只有杨自俭那样完全淡泊了名利的人才行。杨自俭说，他特别喜欢三首诗词，认为表现了做学问的境界，这里我也把它们抄在下面，作为本文的结束。第一首是李翱的诗句：“选得幽居惬野性，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望月披云笑一

声。”这是一种令人向往的治学而忘我的境界。第二首是李白的诗句：“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是一种脱离了世俗的敬业的境界。第三首是王国维的《浣溪纱》：“本事新词定有无，斜行小草字模糊，灯前肠断为谁书？隐几窥君新制作，背灯数妾旧欢娱。区区情事总难符。”这是学术研究永不完善永无止境的境界。我们引这三首诗词，既以之表示对杨先生治学精神的敬意，也希望与大家共勉。

潘文国
2009年3月10日
于上海

序 三

杨自俭先生以重病之躯怀着对老友的一番深厚的学术情谊让儿子转达，希望我为他的文集作序。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难以堪此重托，但又明白老友在这种情况下对我提出的要求是万万不能推辞的，于是我毫不犹豫拿起笔来，勉力而为，写得不好，还望杨自俭先生本人以及读者理解。

我与杨自俭先生的交往始于1990年。那时，他正和李瑞华先生一起合作编写我国第一部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他联系到我，希望通过我请吕叔湘先生为文集题词。吕先生欣然答应，写下了“指明事物的异同所在不难，追究它们何以有此异同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这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这一著名题词。打那以后，出于共同的学术兴趣和爱好，我和他的来往就日趋频繁了，从一起参与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经常性的学术活动，一直到最近两年间共同担任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系列文集（2008）总主编的工作，前后交往将近20年，彼此了解也日益加深。

作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连续两任（1998—2006）的老会长，杨自俭先生有着极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泛的学术兴趣，不仅自己直接从事学会对比语言学、对比文化学和翻译学三大学科领域的实践活动，而且自始至终站在哲学和学科建设的高度，关注着三个学科的理论建设和长远发展问题。读者只要浏览一下文集中经过作者逐篇选定的约80篇文章的篇目和大概内容，便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受学识以及时间所限，下面我主要结合文集内的有关文章谈谈杨自俭先生在对比语言学以及对比文化学两个学科的理论建设方面所作的贡献，借以与读者交流探讨。

杨自俭先生早在上个世纪的 80 年代就为学生开设英汉语法修辞比较课程。在讲授以及搜集材料的过程中,他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发现,虽然当时国内外语界、汉语界和翻译界等有关学界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在吕叔湘先生《通过对比研究语法》(1977)那篇著名演讲的鼓动下,英汉对比研究正在形成热潮,但资料缺乏,有限的一些对比研究的文章也散见各处,于是萌发了编写一本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的想法。这就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的由来。论文集的出版加上吕先生的题词,不仅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宝贵的参考资料,而且还起到了引领学科发展、组织凝聚队伍的作用,“正是本书的出版,才使在此之前各自在英汉对比领域孤军奋战的研究者找到了同道和知音。”(潘文国, 2002)

这本文集并不以筛选出几十篇文章汇编成册为满足,而是进一步通过卷首的述评(杨自俭 1990),不仅逐篇对选录的文章进行了点评,还借题发挥,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对比语言学的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有关各界应该动员起来,认真运用普通语言学理论,对国内外英汉对比的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进行历史总结,从思维方式或研究方法上加以概括,提出假设,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对比语言学的理论模式。

杨自俭先生对对比语言学理论建设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从他后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来看,如收入本文集的杨自俭(1992a, 1994, 1997a, 1997b, 1997c, 1998, 1999, 2000, 2001a, 2001b, 2001c, 2004a, 2004b, 2005a, 2005b, 2006a, 2006b, 2007)等,他几乎从不间断地关注着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建设,就对比语言学的性质、定位、研究对象、目标和任务,以及学科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发表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重要观点。综合起来,我觉得最起码他的以下一些观点对于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建设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

一、对比语言学是一门交叉学科,由于可以借助理论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长期不够明确等原因,至今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它是一门自身理论建设滞后的学科,所以必须大力加强学科的理论建设。(1999, 2004b)

二、对比语言学的学科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要研究学科发展史,尤其要研究学科的思想史,也就是重要观念和范畴发展变化的历史,这是基础。第二要借鉴比自己先进的理论与方法,这是学科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三要关注中外哲学的新发展,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以哲学思维的更新为先导。(1999)关于学科发展史的研究,他认为“要重点研究学科产生的原因以及发展的动力、规律和趋势。要特别注意各个发展阶段中遇到的问题,掌握解决问题的理论与方法,前后联系起来探讨基本观念

和理论与过去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样从早期追踪到现在，你就会站在学科前沿预见学科发展的大趋势，会找到学科发展的突破口。”（1998）

三、吕叔湘先生的题词为对比语言学提出了两级目标，一级目标是找出异同，二级目标是对造成异同的原因做出解释。这两级目标既是对比语言学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对象。（2004b）

四、对造成异同的原因做出解释，应该从语言系统本身以及思维系统两个方面进行探索，从语言的发生机制追寻到它的文化与哲学的根基，最后追寻到原始思维发生学。具体做法上，可以选择不同的内容作为参照，从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语言机制、象似性、语法化、认知工具、认知方法、语言的变异、语言发展史、语言交际的关联性、语言的自组织性、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语言的哲学基础等多方面去探寻。（2000，2004b）

五、对比语言学应有理论和应用两方面的研究，两部分应该分清界限、自成体系。（1992a，1994，2004b）在应用的领域应认真区分“应用”与“应用研究”。从理论与方法到应用有个中间地带。应用研究就是对理论方法和应用之间这个中间地带的研究。（2008）

六、对比研究中过分强调“异”而忽视“同”就违背了语言学发展的趋势和本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因为异同是相辅相成的，应该做到异同并重，不应只偏向其中一个方面。（1992a，1994，1997a，1997b，2004b）在异同方面今后应着重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异同各有哪些种类和等级，二是深入研究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三是同时从语言系统本身以及思维系统两个方面探索造成异同的原因。（2004b）

七、任何学科都应该建立以自己的研究对象为中心的范畴体系。一个成熟的学科应该具有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外延与内涵都界定清楚的分级的范畴，而且这些分级的范畴形成了逻辑系统。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对比语言学在范畴的建立和理论系统的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许余龙（1992/2002）和 Chesterman（1998）等人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2004b：126，2006b）人文学科的范畴系统不易做到像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严密，但至少应划分出几个不重叠不交叉的等级与层次，而且不应该缺少学科的哲学论、方法论和理论史三部分。（2006b）

八、对比语言学的方法论建设应该从哲学、系统科学，以及其他学科三个层面来进行。“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体现在对比语言学中就是研究者和两种语言的关系、两种语言之间的异同、研究者和研究结果的关系以及协调理论研究和研究行为关系的规范与准则”；运用系统科学的“整体观、结构观、环境观、功能观与演化观来研究对比语言学，可以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两种语言之间各种关系的对比研究”；其他许多学科如生物学、脑科学、神经科学、人类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等学科的理